



# 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笔下的 浙江学派

——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分析

朱俊瑞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笔下的“浙江学派”结题成果  
本书由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资助出版

# 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笔下的 浙江学派

——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分析

朱俊瑞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笔下的浙江学派:以梁启超为中心的  
分析 / 朱俊瑞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308-12478-2

I. ①民… II. ①朱… III. ①学派—研究—浙江省—  
近代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7296号



民国时期国学大师笔下的浙江学派

——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分析

朱俊瑞 著

---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hotmail.com)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6

字数 120千

版印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2478-2

定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 前 言

### “国学”概念的提出与“浙江学派”的梁启超发现

“国学”最早的确切含义是指国家一级的贵族学校，西周时期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为国学，是大贵族子弟的学校；各地所设的乡学也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后来“国学”泛指“京师官学”，主要是“太学和国子学”<sup>①</sup>。晚清以降，“国学”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近代所谓的“国学”，“其概念在清末与二三十年代曾几度引起争论，终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无法统一”，“但也大致有其特定的指称对象和范围”，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是把“国学”引申为“中国传统学术”。<sup>②</sup> 张岱年也解释说，20 世纪初，“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了《国学概论》的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

---

① 《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67 页。

② 桑兵：《晚清民初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 页。

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sup>①</sup>。“国学”的确是在中国近代特殊背景下出现的新概念。

近代“国学”概念的使用，梁启超可谓始作俑者。1902年夏秋间，梁启超致函黄遵宪，提出创办《国学报》。虽然现在无法详见此信函的具体内容，但在黄遵宪的回信中，可以间接看出梁启超的办报宗旨和基本设想。黄遵宪信里说：“《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公言马鸣与公及仆足分任此事，此期许过当之言，诚不敢当。然遂谓无编足任分撰之役者，亦推诿之语，非仆所敢出也。”对于《国学报》的宗旨，黄氏的信中说：“公谓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恃此足以立国矣。”看来，梁启超信中至少出现了“国粹主义”、“旧学”两个概念。从黄遵宪的否定性意见中，还反映出梁启超关于“国学”、“国粹”问题的思考受到日本的影响：“持中国与日本

---

① 张岱年：《国学丛书》序，收入《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笔者按：现代学者在解释“国学”的概念时，也一般兼顾国学的本义和近代含义。如《辞海》（缩印本）解释国学：（1）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2）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据《礼记》、《大戴记》及《周礼》记述，西周国学盖由前代学制发展而成，分小学与大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成“六艺”；小学以书、数为主，大学以礼、乐、射、御为主。大学有“东序”、“瞽宗”、“上庠”、“太学”等名称；又有总名：天子所设者曰“辟雍”，诸侯所设者曰“泮宫”。后世国学为京师官学的通称，尤指太学和国子学。[《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767—768页]《汉语大词典》解释国学：（1）古代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周礼·春官·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2）中国固有的文化、学术。[《汉语大词典》（普及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版，第87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没有解释“国学”，相近的概念有“中国古代中央官学”和“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建立的时间是汉代开始。（《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538页）

校,规模稍有不同。日本无日本学,中古之慕隋、唐,举国趋而东,近世之拜欧、美,举国又趋而西。当其东奔西逐,神影并驰,如醉如梦,及立足稍稳,乃自觉己身在亡何有之乡,于是乎国粹之说起。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除了国性差异不宜在中国彰显“国粹主义”外,黄遵宪反对筹办《国学报》的另一个理由是时机不成熟。他认为中国此时需要“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校,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按照黄遵宪的逻辑,倡言“国学”,发扬“国粹”,应该是充分“新学化”或“西学化”后的事情。他谢绝梁启超的邀请,并称“公之所志,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此大事后再往复”。1902年《国学报》议而未成,但学术界还是认为这是“近代国学概念的重要肇始”<sup>①</sup>。

倘若从事近代国学问题的研究,学术的地域性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对于“国学”的地域性与世界性问题,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有过耐人寻味的思考。他说:“学问天下公器,原不以国为界,但各国因其国情不同,有所特别研究贡献,以求一科学中支派内容之充实,此则凡文化的国民所宜有事也。”<sup>②</sup>因此,从学术的地域性的角度“按察中国地理”以观“历史上之变

<sup>①</sup>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sup>②</sup> 梁启超:《〈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梁启超全集》第七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85页。

化”，非但是“最有兴味之事”，而且能够回答若干关乎中华文明的演变的诸多问题。比如，“中国何以能占世界文明五祖之一？”因为“黄河、扬子江之两大川横于温带，灌于平原故也”；“中国文明何以不能与小亚细亚之文明、印度之文明相合集而成一繁质之文明？”因为“西北之阿尔泰山、西南之喜马拉雅山为之大障也”。在梁启超看来，地理环境对华夏文明特别是华夏民族性格的影响“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响形成民族特别性格而此种性格，递代遗传，旋为历史上主要之原动力……故治史者于地理之背景，终不能蔑视也”<sup>①</sup>。按照梁启超的分析，在地理因素的影响下，中国学术不仅具有区别于世界其他学术文化的鲜明特点，中国学术本身也因环境的不同实际存在着南北差异，具体到某一个更小的区域，同样也会绽放出不同的异彩。历史显示，伴随着“国学”概念的提出和国学教育思想的形成，梁启超在中国学术史系列研究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学术经典，也为中国学术的“分地研究”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指导性意见：

**第一，学术的“南北差异”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现象。**

“地理是历史的舞台，历史即地理之骨相。读历史如忽略地理，便失去其中许多精彩的真实的意义。”<sup>②</sup>“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

---

<sup>①</sup> 梁启超：《地理及年代》，《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8—3579页。

<sup>②</sup> 《中国历史地理》，台北世界书局1975年版，第1页。

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慨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他也相信，“自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sup>①</sup>。时代性和民族性的阐述，又要注意地域风格的考察，否则很难解答历史上的许多谜团。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分布格局、分布重心、分布成因和分布规律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章太炎的《清儒》、刘师培的《南北学派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钱基博的《近代百年湖南学风》等，都注重从区域环境的角度来阐释学术的分布与特点。进入 20 世纪，金克木曾著有《文艺的地域学研究设想》，提出对文艺进行地域性研究。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总绪论”在谈到“中国文学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时，也提到了“地域的不平衡”这一现象。该书指出：“所谓地域的不平衡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学的发展有盛衰的变化，呈现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状况。……二是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文体孕育生长，从而使一些文体带有不同的地方特色，至少在形成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如此。”这也说明，学术的地域性研究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 第二，梳理学术的地域性资源是国学教育的重要路径。

1921 年，梁启超完成了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在著作的

---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31 页。



篇末把学术研究“分地发展”作为将来学界的希望之一。三年后，梁启超按照学者的籍贯，完成了《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这也是近代按照时间和空间结构形成的一篇重要的人文地理著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梁启超认为对学术进行区域研究，追溯“各时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乃至遍及文学家、政治家”等等之地理的分布，本身就是从事“治人文科学极有趣味、极有功用之业”；更重要的是期待青年学者“读之而知所兴焉，各自按其籍贯以寻其乡先辈之遗风”。如果生在“文物郁郁之乡，则思如何而后可以无惭于先达，续其绪勿使坠也”，既要思考本乡的学术文化如何维持长盛不衰，又要深思“昔盛而今衰”的原因，引以为鉴。如果生在“昔盛今衰之乡”，更要“夙夜图所以振之，使先辈心力薰铸于吾之潜意识者，迅奋复活也”。如果身在“夙未展拓之乡，则知耻知惧，愈加努力，毋使长为国中文化落伍之区域，而又思夫他乡之所以先进，亦不过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为，诵‘彼丈夫，我亦丈夫’之言，而自壮自力也”。<sup>①</sup>不难看出，学术的区域性研究在梁启超那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命题，还是带有明确的国学教育的导向。

第三，浙东、浙西学风之别被国学大师视为学术的区域研究中的十大学术问题之一。

从概念的解释上，学派的产生标志着一批学者群体前后相继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风格，形成了具有群体性的治学宗

---

<sup>①</sup>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文集》（点校本）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5页。

旨、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在这种意义上,学派与学风是经常被学术界对等使用的两个概念。另外,无论是师承性学派还是问题性学派,学派的出现往往又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民国时期掌握了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大师们更是对学派和学风的地域性的研究整理出十个“问题”：“何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何故考证学盛于江南，理学盛于河北？”“何故直隶、河南、陕西清初学者极多，中叶以后则阒如？”“何故湖南、广东清初学者极少，中叶以后乃大盛？”“何故山西介在直隶、陕西之间，当彼两省学风极盛时，此乃无可纪述？”“何故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何故江西与皖、浙比邻，而学风乃绝异？”“何故文化愈盛之省分，其分化愈复杂——如江南之与江北，皖南之与皖北，浙东之与浙西，学风划然不同？”“何故同一省中文朴截然殊致——如江苏之徐海一带，安徽之淮、泗一带，可述者远逊他郡？”“何故同一郡县而文化或数百年赓续不替，如皖之桐、歙，苏之常、扬……等，或极盛而骤衰，如直之博、蠡，浙之姚、鄞……等？”<sup>①</sup>

显然，无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还是“同一郡县”的文化“极盛而骤衰”，都无法单纯从地理环境中找到正确的解答，更多的是“仁人君子心力之为”。沿着这样的思路，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把论述的重点集中在近代人文渊薮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呈现“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

<sup>①</sup>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饮冰室文集》（点校本）第五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184 页。

省所独占”的壮观景象。然而，民国时期国学大师们这些主要论述还没有引起当代学者足够的重视。

#### 第四，浙江籍国学大师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1923年，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词中指出：“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sup>①</sup>当时胡适的悲观似乎有些道理，但一个世纪后，“民国时期为何国学大师林立”却成为一个世纪之问。而在国学大师梁启超的笔下，明末以后的三百年间更是学术大师结伴而生的重要时期，而浙江籍国学大师又为梁启超反复称道。清代史学之祖黄黎洲，经学大师胡舄明、万充宗，清代程朱一派大师朱舜水，史学大师万季野、全谢山、章实斋，既有高尚的德性涵养，又有深厚的学术造诣，为学境界与人格精神相互映照、内外无间。他们既引领了那个时代的学风，又为中华学人的人格塑造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学术成就滋养了民国一代学人，也为当今的国学教育提供了教学资源。在梁启超的笔下，浙江学派的教育思想直接可以用于当时的教育实践，纠正已经被扭曲了的人格教育。以评述王阳明教育思想而论，梁启超的《为学与做人》（1922年）、《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1926年）、《陆王学派与青年修养》（1927年）等论文多以王阳明之教谈民

①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1923年1月。

国时期的青年教育问题。以黄宗羲的思想而论,梁启超的《明儒学案》(1905年)、《德育鉴》(1905年)、《文史学家之性格及其预备》(1923年)、《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1924年6月)等论著,集中反映了他对黄宗羲学术思想的承继。梁启超有关朱舜水的论述,除了完成10万字的《朱舜水年谱》(1924年),还有《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辩》(1923年)等主要论文的发表,在《儒家哲学》(1927年)等论著中,梁启超也多次表达了对朱舜水人格的推崇。今天,我们拜读他的《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1925年)等长期被学者忽视的学术论文,既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浙江传统学术流派的稔熟,又可以视为在民国初期国学教育背景下他对浙江学派学术价值的新发现。因此,整理和研究梁启超笔下的“浙江学派”,不仅有助于全面地了解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国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借助国学大师们的学术视野,以国学大师“看浙江”来评述“浙江学派”学术思想的地位,更能把握“浙江学派”的内涵和特征。这是一项重大的学术资源和珍贵财富,对当代的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河走东西:梁启超对中国文明特征的地理科学<br>分析 .....   | 001 |
| 一、人类文明演进公例的地理学发现 .....                 | 002 |
| 二、“河走东西”: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的布局 .....            | 006 |
| 三、地理环境与中华民族的形成 .....                   | 011 |
| 四、动态性:“心力”与人类文明的发展 .....               | 019 |
| 第二章 学分南北:中国学术的分地发展 .....               | 022 |
| 一、南北差异与东西之别:梁启超对《史记》地域风俗<br>的新解读 ..... | 022 |
| 二、“分区而论”:先秦学术的“南北互峙” .....             | 029 |
| 第三章 浙东与浙西:梁启超论浙江学人与学风 .....            | 044 |
| 一、浙西学风 .....                           | 045 |
| 二、浙东学风 .....                           | 050 |

|                                     |            |
|-------------------------------------|------------|
| 三、“浙学”渊源 .....                      | 053        |
| 四、姚江学派的传承 .....                     | 055        |
| 五、“宁尊浙东” .....                      | 060        |
| <b>第四章 国学大师：梁启超评三百年间浙江籍学术大师 ...</b> | <b>065</b> |
| 一、“大师十之有六” .....                    | 065        |
| 二、“本朝学者中的大师” .....                  | 077        |
| 三、国学大师的学术人格 .....                   | 082        |
| 四、“三百年间”浙江籍国学大师 .....               | 097        |
| <b>第五章 知行合一：梁启超论阳明心学与近代国学教育 ...</b> | <b>120</b> |
| 一、阳明学说与梁启超国学教育思想的形成 .....           | 121        |
| 二、“知行合一”之教与现代大学教育 .....             | 147        |
| <b>主要参考文献 .....</b>                 | <b>167</b> |
| <b>索 引 .....</b>                    | <b>171</b> |
| <b>后 记 .....</b>                    | <b>173</b> |

## 第一章 河走东西:梁启超对中国文明特征的地理科学分析

按照学科的门类,学术的区域性研究被当代学者归属到人文地理学科中,对于梁启超在人文地理方面的贡献,学术界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sup>①</sup> 梁启超在人文地理方面有影响的代表作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地理及年代》、《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以及《中国史叙论》等,开拓了学术地理的研究视野,打破了中国学术旧有的研究方法和模式,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学术理念。他强调学科知识的交叉和互动,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和视角。

---

<sup>①</sup> 参见曲洪波:《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曹诗图、王衍用:《梁启超的人地关系研究及其学术思想》,《地理科学》1996年第1期;石莹丽:《梁启超对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开拓性贡献——再谈梁启超地理环境论》,《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等等。

## 一、人类文明演进公例的地理学发现

19 世纪末,随着近代进化论的传入,中国学者对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 世纪初,梁启超率先提出“史界革命”。他在 1902 年的《新史学》中,提出了对历史的“新界说”:  
“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既然可以寻求“公理公例”和“因果关系”,这就为历史学是科学的观点埋下了伏笔。正如许冠三所言,梁启超在史学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他把史学作为一门有着内在规律的学科来对待,并用该学科的规律或“公例”来分析历史的发展演变。<sup>①</sup>按照梁启超当时的理解,“地理与历史,最有密切之关系”,“地理与人民二者”又“常相待”。<sup>②</sup>由此决定人类文明的有无和高下,也决定着历史的兴衰变化。尽管他也认识到人类“文明之原因,其所由来甚复杂,固非可仅以一学科之理论而证明之”,但他还是基本上同意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的看法:“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于精神。有健全之肉体,然后活泼之精神生焉;有适宜之地理,然后文明之历史出焉。”<sup>③</sup>在 1922 年所作的《〈中国地理沿革图〉序》一文中,梁启超开篇就强调“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观念不确定,譬诸筑室而拔

---

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 2003 年版,第 46 页。

②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48 页。

③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43 页。



其础也”<sup>①</sup>。

梁启超所言的地理环境或“空间观念”主要是气候、地势条件。他从人类文明早期的地理分布的大视野中,将北半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和南半球的澳洲、非洲、南美洲分别进行了比较,阐明了文明程度差异的地理原因,并分析了气候与地势环境对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影响。

就气候说,人类文明自以温带最宜,苦寒与酷热地区均不适宜,“盖文明之初之发生,必在得天独厚之地。厚者何?即气候温暖,物产饶足,谋生便宜是也”,“历观古今文明,从无文明起与寒地者”。<sup>②</sup>

就地势言,首先以海滨最良,“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海滨居民“活气较盛,进取较锐”,因而濒海国家“文明进步最速”。<sup>③</sup>

其次是河谷平原,“有河流则土地丰饶。中国之有黄河、扬子江;印度之有恒河、印度河;巴比伦之有夭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埃及之有尼罗河,皆其最者也。此等之地,始有农业,人皆土著,民自名田,家族政治一变为封建政治,行国变为居国,而巩固之国体乃始立。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皆在数千年以

---

① 梁启超:《中国地理沿革图》,《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0页。

②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45页。

③ 梁启超:《地理与文明之关系》,《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44页。